

# 《国朝名家诗余》版本及成书考辨

黄贤忠<sup>1</sup>, 郭远霜<sup>2</sup>

(1.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2. 重庆市沙区实验中学, 重庆 400030)

**摘要:**《国朝名家诗余》和《十六家词》虽关系密切,但却并非同一套书。《国朝名家诗余》的首次刊行很可能是出自张潮父子经营的诒清堂,台湾史语所藏本亦源出于此,实为真正的《国朝名家诗余》。而国内其他同名藏本则是以康熙十六年孙默所刊刻的《十六家词》为基础,混入孙默以前刊刻的几部词集,或增或减拼凑而成。

**关键词:**清词;《国朝名家诗余》;《十六家词》;孙默;张潮;版本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4-0099-05

关于《国朝名家诗余》的版本系统、刊刻过程、书名由来等问题,一直存有不同说法。严迪昌先生认为:“《国朝名家诗余》又名‘十六家诗余’,实际是17家,总数40卷。”<sup>[1]83</sup>邓之诚说:“国朝名家诗余十七种,孙默撰,……凡十七家三十九卷。”<sup>[2]80</sup>孙克强先生则说:“康熙十六年,孙默《国朝名家诗余》历十三年陆续刻成刊行。……共十六家,又称《十六家诗余》。”<sup>[3]420</sup>又有人说:“故其最终编成之本命名《十六家词》,又名《国朝名家诗余》。”<sup>[4]115</sup>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 一 《国朝名家诗余》几种版本比较

据笔者检索国家图书馆古籍系统,并参考各种文献资料得知,这套丛书在目前大陆的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残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钞本)、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残本)以及台湾地区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残本)均有收藏,不过各馆所藏的版本和刊刻年代不尽相同。林玫仪先生曾用她本人亲见的四种版本(大陆的史语所本、上图本、中科院本和台湾“国图”本)比对,发现台湾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所收藏

的这套殊为不同。差别之处主要在于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史语所藏本书前无总序,其余三本皆有序言,惟顺序不同<sup>[2]79-80</sup>。

其二,史语所藏本无扉页,目录的标题、版心、目录中有“国朝名家诗余”、或“国朝名家诗余总目”、或“国朝名家诗余总目终”等字样,全书未见任何提及“十六家词”之处<sup>[2]79</sup>。其余三馆藏本则“均有扉页,署‘王阮亭陈其年两先生评选/国朝名家诗余/本衙藏版’,后有康熙戊申十月陈维崧,‘国朝名家诗余序’……标题并版心均做‘十六家词目录’”<sup>[2]80</sup>;“而中科院及国图藏本总目均做‘十六家词’”<sup>[2]85</sup>。

其三,史语所藏本中,有十三家词人的词集卷首处题有“张潮山来校”的字样,而其余三本俱题为“孙默较”,未见任何地方有“张潮山来校”的字样<sup>[2]82-84</sup>。

其四,史语所藏本在《梅村词》卷上之正文首页,版心有“诒清堂”字样,而上图所藏,则仍做“留松阁”<sup>[2]85</sup>。

其五,据四套藏本的总目录来看,史语所藏本的收录数量是十四家词人,而其余三本虽在目录中都

收稿日期:2011-10-28

作者简介:黄贤忠(1970—),男,重庆市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郭远霜(1985—),女,四川泸州人,文学硕士,重庆市沙区实验中学教师。

显示收录了十六家词,但实际收录的情况却各有不同。上图、中科院本多出程康庄《衍愚词》、孙金砺所辑的《广陵倡和词》和《红桥唱和词》;国图本是残本;史语所藏本中,董俞的《玉凫词》脱落,而收藏者另补入董以宁的《蓉渡词》和王士禛的《衍波词》<sup>[2]79-84</sup>。

据此推知,史语所藏本很可能是一本真正的《国朝名家诗余》,因为这套书始终采用的都是《国朝名家诗余》这一书名,全书没有任何地方曾出现过“十六家词”这一让人混淆的所谓别称。遗憾的是,这套藏本缺失了序言和《玉凫词》后面的一部分,不然应该会有题跋和刊刻时间等信息附于其中。而其余三套则明显由《十六家词》混入《衍愚词》、《广陵倡和词》、《红桥唱和词》等词集,或增或减拼凑而成。

断定其余三套藏本出自拼凑的理由如下。

其一,这三套书均有扉页,署“王阮亭陈其年两先生评选/国朝名家诗余/本衙藏版”,这里未提及孙默,且王士禛和陈维崧并非此书的主要编选者(详见下文),这里却全部归功于此二人,显然不是事实。

其二,这三套书扉页既然题名《国朝名家诗余》,那何故全书总目、标题以及版心均做“十六家词”字样?前后的矛盾之处表明,此书必定出现在《十六家词》刊行之后,而且很可能是在《十六家词》的基础上重新加上印有“国朝名家诗余”字样的扉页印行的。

其三,这三套书前均有《国朝名家诗余序》,署名陈维崧撰。这篇序言中虚假、荒唐、矛盾之处甚多。序中说:“余始集三家词,又广以六家,寓内既传诵矣。因更搜罗,若波斯之购宝,贪获有加。得两陈子、两董子词,合而刻之。四君子夙有才名,名非以词也,而才之余寄于词,是非诗之余而才之余也。……康熙戊申十月,宜兴陈维崧其年题识。”<sup>[5]3</sup>事实上,徽州词人孙默刊刻三家词、四家词、六家词之事早已广见于清代各种文献记载,相反,却没有任何文献表明陈维崧曾参与此事,此处却赫然将孙默的功绩冠以名人陈维崧所为,显然出自捏造。其次,所谓的题序人“陈维崧”在序中大肆吹捧自己“夙有才名,名非以词也,而才之余寄于词”,也大违写序的谦恭之道,令人着实不解。再者,序言的内容和题识表明,序言撰写时间是康熙七年。另据施廷镛《中国丛书综录续编》中对《十家词》的版本记载“(清)康熙七年(1668)休宁孙氏留松阁刊本”<sup>[6]348</sup>,可知这正好是孙默刊刻《十家词》之时。据这篇序言内容可以得知,这部丛书实际共收录了10位词人的别集,它原

本是孙默自己为《十家词》所做的序,但这里却被人将部分内容篡改后变成了所谓的陈维崧撰《国朝名家诗余序》。

其四,既然收录的词集中包括程康庄《衍愚词》、孙金砺所编《广陵唱和词》和《红桥唱和词》,为何不见在总目中言明或提及,但在实际收录中却全部收入?以孙默为刊刻词集倾家荡产所付出的认真和心力来看,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明显的失误。

综上所述可推知,这是一套出于商业目的,在孙默去世之后,经过篡改、拼凑而成的丛书。其中之所以出现“国朝名家诗余”、“陈维崧”、“王士禛编选”等字样,应该与这些信息在当时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有直接关系。首先,在康熙时期《国朝名家诗余》可能已经广为文人所推崇;其次,康熙十七年以后,陈维崧以博学宏词科及第,入翰林院编修明史,为阳羨词派宗主。而王士禛早年主盟扬州词坛,名动江南,后又贵为文坛盟主、朝廷重臣。编造这些信息,显然对书籍的销售是大有好处的。

那么《十六家词》与通常所说的《国朝名家诗余》是什么关系呢?参考邓汉仪在《十六家词》中的序言、黄裳《来燕榭书跋》的记载、汪懋麟《孙处士墓志铭》的内容可知(详见下文),《十六家词》刻于康熙十六年,而现存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十五家词》正是这本书的删减版。《古籍版本题记索引》记载:“十六家词三十九卷 清孙默辑 清刊本 [39]·辛·30”<sup>[7]354</sup>,检索该书的采用书录代码表发现“[39]”对应的内容是“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十集) 清沈初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本”<sup>[7]7</sup>。由此可知四库馆臣采集的原书就是《十六家词》,而非所谓《十五家词》。林玫仪先生以四库全书版《十五家词》中邓汉仪《十五家词序》序言与中科院、上图的《国朝名家诗余》中的相应内容比较,发现两篇序言内容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四库全书版《十五家词》除将所有序言标题删掉,总称为十五家词原序之外,“今者娄东、淝水、棠村诸公首建旌旄”一句被改为“今者娄东、棠村诸公首建旌旄”。显然删掉的“淝水”正是龚鼎孳,同时所有原序中“十六家词”之处俱改作“十五家”。《十五家词》中恰巧缺了龚鼎孳的《香严词》<sup>[2]87-88</sup>。另黄裳《来燕榭书跋》中也有对《十六家词》记载,他说:“十六家词,康熙刻。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有留松阁三字。前有康熙丁巳南阳邓汉仪孝威序。次目录。扉叶大书

‘十六家诗余’，上下题‘同学诸子评’……集前各有序目……”<sup>[8]278</sup>将上述内容与林玫仪先生文中内容，以及上图馆藏《国朝名家诗余》书目著录比对，发现各家目录中所列词集顺序完全一致。而将其与《十五家词》比较，除删掉了龚鼎孳《香严词》外，顺序也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台湾史语所藏本全书书名、目录、标题和内容完全一致，且与国内其他图书馆藏本明显不同，应为真正的《国朝名家诗余》。而国内其他的同名藏本，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朝名家诗余》实为《十六家词》混入《衍愚词》、《广陵唱和词》、《红桥唱和词》，或增或减拼凑而成。这也正是多数人一直把《十六家词》和《国朝名家诗余》视为一套书的原因。至于文渊阁四库版《十五家词》则是一本被四库馆臣删改过的《十六家词》。

## 二 《国朝名家诗余》之名始于何时

那究竟《国朝名家诗余》之名始于何时呢？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孙默是否一直都有编著一本名为《国朝名家诗余》丛书的计划呢？据汪懋麟《孙处士墓志铭》记载：“（孙默）尝集诸名家词，期足百人为一选，俱未果，其属余序而先版行于世者，止十六家词。”<sup>[9]197</sup>又邓汉仪序言说：“而无言曰：吾方以鸣始也，十五家倡之于前，自此而数十家而百家，兹不其先声也与。”<sup>[5]5</sup>这些材料证明孙默一直都有刊刻百家词集的计划，但没有任何信息表明他曾决定用《国朝名家诗余》作为最后的书名。实际上，他一直都有以收录词人具体人数命名词集的习惯。比如“《三家词》康熙三年（1664）天都孙氏留松阁刊本”<sup>[6]347</sup>，“《六家诗余》康熙六年（1667）休宁孙氏留松阁刊”<sup>[6]347</sup>，“《四家诗余》康熙七年（1668）休宁孙氏留松阁刊本”<sup>[6]347</sup>，“《十家词》康熙七年（1668）休宁孙氏留松阁刊本”<sup>[6]348</sup>，以及康熙十六年编成的《十六家词》等都是证据，也许《百家词》才是孙默最后想要的书名吧。据中科院藏本捐赠者——黄裳抄录的原书题识可知，此书的原收藏者邓之诚曾对此书的成书命名过程有一个描述：“初默辑三家词，曰《丽农》、《延露》、《衍波》，刻于甲辰，合《南溪》、《炊闻》、《百末》曰六家，刻于丁未，合《寒影》、《乌丝》、《蓉渡》、《玉鳧》四家，刻于戊申，始名《国朝名家诗余》；至丁未又刻其余，始有十六家词之称。《衍愚》又后来所刻。”<sup>[10]301</sup>此说为后来学人相互转引遂成定说，但很明显邓之诚“刻于戊申，始名《国朝名家诗

余”的表述受了陈维崧序的误导，而陈序不成立，则此结论也就不能成立。事实就是《三家词》、《六家词》、《十家词》、《十六家词》才是孙默刻书的正确书名和顺序，至于是否真有陈维崧序言中所说的那本录有十家词集的《国朝名家诗余》，目前未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次，邓之诚说“《衍愚》又后来所刻”也非事实，而是刻于康熙六年，有孙金砺序言为证<sup>[4]116</sup>。

据目前有关研究资料和文献来看，诒清堂刊刻的《国朝名家诗余》成为唯一可靠的起点。该书的刊刻年代，笔者以为据两点可以推知。其一，上图、中科院的藏本应该是刊于康熙一朝的某个时候，但必定是在康熙十六年《十六家词》刊行之后。在这两个藏本中，王士禛的“禛”并未被改写作“禛”，由于避雍正的讳，雍正一朝“王士禛”始改为“王士正”或“王士徵”，乾隆三十九年后再改为“王士禛”<sup>[11]39</sup>。从上图、中科院这两个藏本的情况来看，均写作“王士禛”，而《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丛书广录》中收录的其他藏本的《十六家词》、《十九家词》等相关书中均都写作“王士禛”，故而推定上图、中科院藏本的《国朝名家诗余》应该是刊行在康熙一朝。而这些书中提到或使用了“国朝名家诗余”的字样，可知这个书名在此之前已有使用。其二，诒清堂本的《国朝名家诗余》有多处张潮和孙默合作校书的记载，但同时该书又未曾提及“十六家词”一说，另外考虑到张潮于康熙十四年来扬州和孙默于康熙十七年去世的两个时间因素，故而推知此书刊刻年代约在康熙十四年至康熙十六年之间。如无其他相反证据，则可进一步推知，首次刊刻《国朝名家诗余》的就是张潮之父的诒清堂，《国朝名家诗余》之名正是起源于此，史语所藏本《国朝名家诗余》也是出自这一系统，它与国内其他藏本并无干系。

## 三 《国朝名家诗余》的编者和刊刻者

虽然，我们不能说《国朝名家诗余》的编者和刊刻者就是孙默，但毫无疑问，孙默就是这些单个别集的搜集者和刊刻者。邓汉仪曾如是描述孙默搜集《十六家词》的执著和艰难：“黄山孙子无言，以穷巷布衣，留心雅事，每有佳制，务极搜罗，如饥渴之于饮食，甚至舟车裹粮糗，不惮冒犯霜露，跋涉山川以求之，故此十六家之词<sup>①</sup>，皆其浮家泛宅，弹力疲思而后得之者。”<sup>[5]4-5</sup>由于孙默在扬州与文人、名士过从甚密，所以在清初的文献中有不少关于他生平行状

的记载。通过扬州词人汪懋麟给他写的这段墓志铭：“处士讳默，字无言，又字桴菴，……卒之时实康熙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六，归葬白岳。”<sup>[9]197-198</sup>我们可以确知孙默生于1613年，卒于1678年。孙默搜集词作的活动可能始于顺治年间，据说最迟在顺治八年以前他就已经来到扬州，证据来自扬州人孙枝蔚《送无言归黄山》的序言：“辛丑岁，无言游于广陵且十有余年焉。然后即归黄山老焉。”<sup>[1]81</sup>另外据《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记载，孙默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曾寄淮安学籍<sup>[12]667</sup>。不过严迪昌先生据此怀疑孙默在扬州从事反清复明的政治活动，可能只是一种猜测，因为大量出自清初扬州文人的文献表明，孙默只是一个留心于词作刊刻整理的布衣文人，而且他和某些朝廷要员关系甚好，其中包括历仕两朝的“贰臣”。利用这些关系，他无私地为那些沉寂无名但又富有才华的文人朋友延誉求名。事实上，这个广泛的、良好的士人交游圈为孙默成功搜集词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孙默最初刊刻的《三家词》就是出自扬州的三位名士——王士禛、邹祗谟和彭孙遹之手。孙默《十六家词》的刊刻行动始于康熙三年，据王士禛回忆：“康熙癸卯，岁将除，孙无言默欲渡江往海盐，访彭十羨门，人问有何急事，答曰：‘将索其《延露词》，与阮亭《衍波》，程村邹祗谟《丽农词》合刻之。’”<sup>[13]842</sup>其后孙默用了大约十三年的时间，总计共刊刻了十七家词(包括程康庄的《衍愚词》)，其刊刻时间和顺序如下：

康熙三年，《三家词》刊行。康熙六年，《六家词》刊行，除了原来三家词中的《丽农词》、《延露词》、《衍波词》词外，增加了曹尔堪的《南溪词》、王士禛的《炊闻词》、尤侗的《百末词》，同年，程康庄的《衍愚词》刊刻。康熙七年，《四家诗余》刊刻，收录陈世祥《含影词》、陈维裕《乌丝词》、董以宁《蓉渡词》、董俞《玉鬼词》四家词人的词作。同年又继续刊刻《十家词》，其内容实为《六家词》和《四家词》的汇编。《十家诗余》之后，孙默又编成宋碗《二乡亭词》、黄云《溪南词》。据序言推测这两本词集的刊行时间应该在康熙九年左右。康熙十六年《十六家词》刊刻。<sup>[14]44-45</sup>

这里有一个颇为蹊跷的问题是孙默的字号，有学者认为黄岳山人就是孙默的号，某些工具书亦如是记载。但目前除了一条材料之外，并无其他文献

支持这一说法。而唯一支持这个说法的证据恰恰出自四库全书收录的经过篡改而变得怪异的《十五家词》，其中孙金砺有段序言说：“黄岳山人，生平无他嗜好。……山人谓谁？休宁桴菴孙默也。”<sup>[5]3</sup>如前所述，由于四库全书版的《十五家词》是由孙默《十六家词》经四库馆臣恣意删改而来，加之序言部分篡改尤多，所以这部分内容的可信度是令人怀疑的。即使这部分未经改动，我们也可以有另外解释，因为原文中并没有明确说黄岳山人就是孙默的号，那么我们把“黄岳山人”的意思理解为来自黄山的隐士似乎也并无不可。然而巧合的是，在检索文献中笔者却意外发现清代号黄岳山人的文人恰恰就只有张习孔一人，而刊刻《国朝名家诗余》的诒清堂的主人、词人张潮的父亲正好就是张习孔。这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原来没有经过篡改的序言中很可能提到了张习孔，也就是张潮的父亲。而这也再次证明了《国朝名家诗余》和诒清堂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国朝名家诗余》中的词集俱来自于孙默多年的搜集整理，但并不能说这些词集本身就是《国朝名家诗余》，正如前面所说，孙默很可能从来没有打算以此为名刻书，此书名的由来其实源自于诒清堂，所以我们必须提到另一个与《国朝名家诗余》成书有关的参与者，一个常常被研究者忽略的文人——张潮。台湾史语所藏本《国朝名家诗余》共计收录十四家词集，其中就有十三家词人的词集卷首印有“张潮山来较”的字样，这一有力证据表明张潮在康熙年间的确曾参与《国朝名家诗余》一书的校对和刊刻，当然也有研究者怀疑这些证据是张潮篡改孙默原书而留下的，或者也有人说张潮只是刊刻资助者而未参与刊刻。但“诒清堂”三字作为书坊的标志是没有理由乱用的。如果抛开这一证据去猜测其他可能，似乎也很难令人信服。张潮何时到扬州目前尚难定论，但据张习孔《诒清堂集》卷首的序言可知该文集刊于康熙八年，同时在该文集每卷的卷首处，反复出现“男潮山来校”的字样，同时林玫仪在论文中也曾提到史语所“另藏有康熙间留松阁刊本《玉鬼词》二卷，……作‘天都张潮山来较，卷下作‘休宁孙默无言较’”<sup>[2]84</sup>。由此可知，张潮可能在康熙八年以前已经来到扬州，他不但参与自家书坊的校书，同时也参与孙默留松阁的校对工作。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张潮在扬州刊刻编撰的图书数量非常巨大，远非孙默所能比拟。现今存世的

《虞初新志》、《心斋杂俎》、《心斋诗钞》、《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尺牍友声》等大型丛书均出自他的编撰。在这些书籍的序言和题跋中常附有诸如“免致浮沉，早邮珠玉”，“此选之外，尚有嗣选，《古世说》、《古文尤雅》、《古文辞法传集》、《布粟集》、《壮游便览》诸书。次第告竣，就正有道，凡有谬误，幸赐教言。心斋主人识于广陵之诒清堂”<sup>[15]</sup><sup>418</sup>之类的刊书广告，这些证据表明张潮当时的社会身份是书商，同时张潮也是一位词人，现有词集《花影词》一书存世。另外张潮的父亲曾官至刑部侍郎，归隐后遂于扬州经营诒清堂书坊。显然，不管我们从张潮的家世、社会身份、还是个人才识来考量，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不但有能力，也有财力参与《国朝名家诗余》的刊刻。

如无其他相反的证据，可认定《国朝名家诗余》这个书名始于张潮的诒清堂，书中收录词人词集十四家，刊刻时间大致在康熙十四年到十六年间。不

过很明显这个版本刊行数量应该较少，故世所罕见。其后孙默于康熙十六年在留松阁刊刻《十六家诗余》（即《十六家词》）。后来在康熙朝的某个时候，这部书被留松阁简单加入了以前刊刻的《衍愚词》和孙金砺编辑的《广陵唱和词》、《红桥唱和词》<sup>②</sup>连同《十六家诗余》一并刊行。可能是出于某种商业考虑，增加了有“王士禛”、“陈维崧”、“国朝名家诗余”等字样的扉页和伪造的陈序，而这套书就是国内多处图书馆所藏的《国朝名家诗余》。乾隆编撰四库全书时，实际上收录的正是《十六家诗余》。由于乾隆皇帝憎恶龚鼎孳，四库馆臣于是尽删其书，遂成《十五家词》，此书后又被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收录（据文澜阁、文津阁校辑）。有研究者认为国内的《国朝名家诗余》有两套系统，一套是四库版的，一套是留松阁版的。其实这两者都是《十六家诗余》的延续，只是一个被删改，一个被拼凑而已，连目录都没有更换。而真正另外的一套系统是诒清堂张潮参与校对的《国朝名家诗余》。

#### 注释：

- ①此处四库本原文为“十五家之词”，据有关信息而改之，详情参见正文。  
②《红桥唱和词》收录的不是词，而是红桥唱和的诗集。

#### 参考文献：

- [1]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林玫仪.邹祗谟词评汇录(之三)[J].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4,(3).  
[3]孙克强.清代词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李丹.顺康之际广陵词坛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孙默.十五家词[G]//文渊阁四库全书:14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施廷镛.中国丛书综录续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7]罗伟国,胡平.古籍版本题记索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8]黄裳.来燕榭书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9]李桓(辑).国朝著献类微初编[G]//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189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  
[10]黄裳.来燕榭读书记:下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1](日)李锐清.王士禛名号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4).  
[12]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3]王士禛.渔洋诗话[G]//文渊阁四库全书:14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郭远霜.论徽商对清初扬州词坛的影响[D].重庆:西南大学文学院,2010.  
[15]张潮(辑).虞初新志[G]//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3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唐 普]